

容闳二三事

容闳晚年是在美国度过的，他早年留学回国后，满腔热情，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，想尽办法争取清廷派遣留学生，但计划未能全部实现，工作上屡遭碰壁，使他大为伤神。在老境到来之际，他花了数年时间，用英文写了一部自传性的回忆录：《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》，于1909年在纽约印行，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把它翻译出版，改书名为《西学东渐记》，文革之后有重印本。这是一部了解容闳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及“西学东渐”的好书。（以下引文都出自该书。）

容闳出身贫苦，能出洋留学全靠别人资助，中学毕业之后，校董会答应提供升大的费用，但附带条件，学成回到中国须当传教士，他谢绝了，他说：“传道固佳，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。”并表明“不以食贫故猝变宗旨。”他的宗旨就是教育救国的理想，他不想为五斗米折腰，宗旨既立，就不能改变。后来幸好有一妇女组织肯伸出援手，才免陷入困境。

容闳在大学时代已归化入籍，毕业后在当地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全无问题，有人当时劝他留下，可他时刻不忘自己身上流着炎黄子孙的血，他回答说：“予意以为予之一身，既受此文明之

教育，则当使后予之人，亦享此同等之利益。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”毕业后毅然归国，可叹的是当时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位洋进士，他不经科举，没有功名，担任不了高职，只好自己谋生路。他一度在上海的海关任职，待遇不错，但当时海关操纵在洋人手里，反客为主，霸道十足，他看不惯，愤然离去。后来在一家洋行做事，经理原想提拔他到日本的分行当买办，他拒绝了，说：“买办之俸虽优，然操业近卑鄙。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，故予极重视母校，尊之敬之，不敢使予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。”他这种洁身自爱，并顾及母校声誉的言行使那位洋经理十分惊讶和钦佩。

清廷批准了容闳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后，他就忙于投入物色学童的工作，工作开展得不顺利，因为所选对象必须是聪颖好学的，本来就不易；而一般家庭对出洋留学又缺乏认识，对孩子远离故土，长时间到碧眼黄发儿之邦学习，多持消极态度，故可供筛选之面有限。他从上海到了香港，听一位同乡说南海有一名学童甚聪慧，他就鼓动那位同乡去游说学童的父母，那位同乡十分卖力，并以自己的女儿许配作为条件说服了那学童的父母，那学童后来终于成才，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天佑。容闳经香港回故里，受到乡亲热烈欢迎，他趁机发动乡亲集资办学，并带头捐五百两银子办起了甄贤学校，此校乃近代我国民间集资办学之首例。

容闳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光辉的，也是崎岖坎坷的。他的良好愿望与理想，屡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，但他对祖国从未失去信心，对祖国时局的变化甚为关心。对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斗争，他寄予满怀的希望，辛亥革命成功后，他已处风烛残年之时，无力再为新政权效劳了，就鼓励后辈回去。他与美籍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观彤与观槐都毕业于耶鲁大学，学有所长，当时在美已有一份理想的工作，生活安逸，且生长在外国的混血儿，要

他们回国服务，一时想不通，容闳便严厉的对他们说：“吾费如许金钱，养成汝辈人才，原冀回报祖国，今不此务，唯小人利喻，患得患失，殊非吾所望于汝二人者。”严父教子有方，使孩子终能接受大义，于是回国了，他们后来都当上了总工程师之类的职务，为祖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1996.10